

近代上海文学系年丛书

近代上海散文系年初编
(1843—1916)

名誉主编	王元化
主 编	胡晓明
编 著	程华平

上海教育出版社

书 名:近代上海散文系年初编
作 者:胡晓明 著
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ISBN :7-5320-8471-X/I · 26
定 价:23.00

再认文学上海(代总序)

胡晓明

若干年前,去看施蛰存先生。施公见面即问:“你的博士论文,做了什么题目?”答曰:“《中国诗学之精神》。”施公随即摇头:“这个题目太大。”那时,我心里还真有些不以为然。年轻时不敢做,何时才做?等到这些年多少看了一些近代文学的材料,再回头看看自己从前那以“中国……”为题的文字,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寅恪先生自许平生为“不今不古之学”,且说其常识的意思:因为中古以前的材料太少,太易于逞新说,而中古以后的材料又太多,不易于深透把握。寅恪先生是那样兼具谨严精审的眼力与通达大气的史识,做中古的学问之所以能出绝大成绩,他的性情与学问材料之间有一种恰当的配合,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人曾以生命的长度与中国文史材料的程量作一简单比较:先秦两汉,患材料太少;六朝隋唐,稍少;宋,可能刚好相等;元明,材料或多出一倍;清代,或须几辈子才能消化材料;近代,又比清代多出不知几倍……面对至今仍然尘封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大量近代文史材料(且不必说近代人已经消化了的前人材料,亦构成今人掌握的“近代文史材料”之一部分),要想做近代文学的综合研究、宏大叙事,——咄!你孙悟空再是有天大本事,也还得乖乖地跟着唐僧一步一步走来!

因而,当三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大康、山林等诸友开始着手《近代上海文学与文献》的课题时,我们真的只想本本分分地划定上海的

2 近代上海散文系年初编

范围,从编年材料做起,一家一家地查访,一笔一笔地考述、过录,老老实实地做文学文献学的基本工作。我们的想法是,既然我们这几人皆以文体为专攻,何不从分体文学(即诗学、词学、小说、戏曲、散文)的角度,齐头并进,大家各自去做一种系年,——以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系时、系地的双重努力,去共同凸显文学上海在近代中国的真实面目?而近几年来,编年史体裁又成为文学研究更进一步走向客观实证、文学史撰写回归本土传统的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探求。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说:“编年史是一种十分宏大宽容的历史载体,不论叙事、说理乃至写景、抒情,都可以在其中随意处理;而且又可以通过时间、空间的纽带将其熔于一炉。《左传》,特别是《资治通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范例。……我们对古代编年史的杰作学习得还是很不够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处于史料纷繁、著述草创的近代文学,我们更是在这种学习尝试之中。譬如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各自有其相当不同的特点,如有的内容在某一时期特多,有的相对来说较少,这就决定了有的时间范围较长,有的则相对较短。有的文体,其重心在于传媒(如小说、散文),有的则重点在诗友结纳的作家活动(如诗词),这也决定了系年的编撰不能强求一刀切,须尊重文体各自的特点。尽管如此,这个课题仍能以前空详尽的材料、整幅的细致的文体发展过程、丰富复杂的作家交往、作品接受状态,及丰富多样的文学事件、精神生活细节以及鲜明的时代地域文学的特征,去网罗散佚、拾遗补阙,完成一件文学学术上的新追求。——三年之后,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套以“初编”命名的丛书。

陈大康教授的“近代小说系年”一种,由于先期完成,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报刊中的诗词作品,虽然已有《申报篇目索引》等重要工具书,但大量文艺期刊及大报副刊,其中分体文学篇目索引有待于更进一步大规模的集体科研的努力。这套丛书暂不涉及。

回想起来,当我们真正亲手触摸近代上海文学的材料时,竟会有一种开荒、探险的意味!好比上黄山:戴上旅游帽,跟着前面的小旗子,走那人流熙攘的大道么?你也可以不这样,你发现竟然可以有无数的小道,通往人迹罕到的风景,予人以莫名的兴奋!首先是新材料新问题太多。有朋友说:唐诗宋词,新材料都没有了,新题目都做完了!有人曾专门撰文指出,在中国小说学的领域里,重复研究的大量精力,花在寥寥可数的几部名著上,而许多近代小说,几乎是无人去碰的。在诗学词学的领域里也同样。比如在上海住过多年的陈三立,诗才之大、诗功之深、诗艺之妙,置之李杜苏黄前,绝无愧色;而思想文化之复杂魅力,则有过之。其实他那句“来做神州袖手人”,完全是愤激之辞,他哪里是不关心国事的自了汉!而我们的学界,多年来就因为他“不进步”,连他的诗集都没有人去整理。陈三立同时的诗人词人如沈曾植,这位与文化上海关系极深、被他的学生王国维誉为集清代学术之大成的老师大儒、被张尔田称“其诗自是千古”的大诗人,其诗学,钱仲联先生评为“发千古之秘”,——可是,他的集子《海日楼诗》的注本,据说由于难度太大,在出版社一放就是十载春秋,七易编辑!且不要说进一步的研究了。近代重要诗人词家,如朱祖谋、夏敬观、况周颐、陈宝琛、沈瑜庆、李宣龚、黄节、杨钟羲、金天羽、吴庆坻、徐珂、陈曾寿、冯煦、陈夔龙、瞿鸿 等人,似乎都没有人去为他们编年谱,有的甚至连小传、志略、行状等都没有。而近代的诗社、词社,仅上海一地而言,就有超社、逸社、星社、南社、寒隐诗社、希社、春音社、沅社等,此起彼伏,参与之人数、旨趣之歧出、成因之多元,皆为传统中国所罕有,而深具文学社会学的丰厚意涵。近代的流人文学、报人

在此编校样到来之前,我幸已收到中华书局顾青先生寄来的钱仲联教授注《海日楼诗》。

文学、名士文学、遗民文学……皆构成极丰富多样的文学“未命名群落”，仅辛亥之后几年，诗学之美盛，可谓以一地敌一国，足当陈三立所谓辛亥后“获偿而荷其赐者，独有海滨流人遗老，成就赋诗数卷耳”。再看上海近代所接纳养育的众多诗人的构成情况，他们当中有教师、地方官、布衣、青年学子、遗老、艺术家、翰林院的编修、改革的政治家、巡抚大人、革命党人、和尚、贵公子、同盟会的干将与出版家、商人等等。其社会成分之复杂纷纭、其作品所体现人文景观之异彩纷呈，应不亚于六朝、隋唐的文人世界。而小说种类之繁多（有人统计有250多种）、外来刺激之活跃（舶来品如政治文学、科幻文学、未来文学等不一而足）、传统新变之多样（由士子而报人艺人文人、由旧文学而新文学外来文学，其中传统资源极有用，待发之覆甚多），可谓中国小说史上的“文体的狂欢盛事”，或“作家的战国时代”，——这一切，与研究的现状当然是极不相称的。

如果再推而论及近代文学所蕴含的思想课题的丰富性，则除了重视材料的开发之外，不能不承认“范式”的转换所带来的新视角仍是十分必要的。人们早就发现近现代史学远比近代文学活跃、有新意、有力量。在我有限的泛读经验中，在原有的反帝反封、爱国主义之外，有不少新观照点和解释框架都被提出来了，譬如所谓“秩序危机”（林毓生《近现代中国史上若干重要问题》）、“身体与灵魂的双重危机”（张灏《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所谓“未完成的现代性”（哈贝马斯一本书的书名，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被压抑的现代性”（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式》）（后二者是从哲学中得到借镜），所谓“连续与变异”、“外来的合法性”（柯伟林《认识20

参于润琦：《清末明清小说分类简述》（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学术论文，福州2000.10）。

世纪的中国》)等,并非老病复发又回到那喜谈“中国……”的宏大叙事,也并非总是随哲学、史学之后而没有文学的独特声音,而是我切近地感知了近代文学所含有的思想富矿,实不忍再认文学仅是文学而已。尤其是上海,承接几千年人文渊薮的江南文化的氤氲化育,容受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南北政经气候之波诡云谲,面迎欧风美雨呼号拍击、中西文明交汇最新鲜、直接、强大的冲击与回应,比汉唐文学更为精彩的文学历史,倘若不能观水观澜,而尽其义、而传其神,岂不可惜、岂不可惜!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株守一家一门之言,或仅仅削足适履地、以一种貌似学科分工、实为形式主义的观点,拘执于所谓“文学特性”,而是将文学置于更大更真实的“上下文”之中,我想近代上海文学在将来的学科发展中,一定会对中国文学研究有比现在更大的贡献。这是我写在前面的一点感想,至于朝向目标的努力,仍是一步步地走去。

2001年11月于日就月将斋

前 言

本书著录的对象是上海近代散文,因此,有必要首先对“近代”的时限作一个规定。

目前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比较通行的理解,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40—1949),约 110 年时间;而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倾向于将近代文学的时限规定在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之间(1840—1919),约 80 年时间。就具体的上海文学发展来说,我认为从上海的开埠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1843—1916)这一段时间,为“上海近代散文”发展大致的起讫时间,这样划分可能更贴近实际情况。

的确,1840 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式的重要年份。这一年至 1842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导致了清廷被迫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列为通商口岸向列强开放。1843 年 11 月 8 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英国领事巴富尔从定海乘“麦都萨”号轮船抵达上海。14 日,巴富尔向“全体英国臣民”发出通告,已在上海暂设领事馆。17 日,上海正式成为通商口岸。两年后的 11 月 29 日,上海道台宫慕久公布《上海租地章程》,英租界设立。从此,上海,这个江苏省松江府下属的偏远小县,开始进入了一个畸形、急速发展的时期——近代。上海近代散文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迥别于全国其他内陆省份、有别于传统散文生存环境的大背景下

进行的。因此,“近代”,在这里不仅是一个表示时间范畴的概念,而且是一个能够说明上海散文在此时间范围内性质的概念。也就是说,作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心,上海不仅有着人文荟萃的历史背景,移民城市的开放心态,而且众多的西学传播媒介,大量的西籍译书,发达的出版机构以及华洋杂处、相对优越的生存环境、谋生手段,在急速地改变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更在强烈地震荡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海散文基本上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传统思想与西方观念碰撞的中心发生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

应该承认的是,中国文学由古代进入近现代,与西欧诸国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手段实现文化转型的内生型近代化模式不同,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是在外力的推动下,在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对传统封闭体系猛烈冲击下而作一系列变革的。这样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个历史阶段乃至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一个十分必要的环节,它起着承上启下、革旧启新的作用。我们将上海近代散文的起点落实在上海近代开埠这一时间上,正是试图把握上海散文在近代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

同样应该承认的是,在近代,相沿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总体框架仍没有也不可能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被彻底打破。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上海近代散文还很清晰地拖着一条传统的尾巴,许多作家在创作的时候还不由自主地频频回身向传统张望。上海近代散文可以说是新瓶装新酒有之,旧瓶装新酒有之,旧瓶装旧酒甚至新瓶装旧酒亦同样有之,中西交汇、新旧杂陈,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可谓是上海近代散文的总体面貌。1917年初,中国文学发展的中心开始由上海向北京转移。彻底打破传统的旧文学格局,真正产生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文学思潮与文学革命,是紧随其后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它真正开创了一个崭新

的文学发展阶段。

二

一直到 1917 年 5 月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提出“文学散文”之前,我国古代文学家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散文”概念。最早从文体分类角度使用“散文”一词的,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南宋周必大。罗大经《鹤林玉露》引用周必大的话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这是一个与诗骚及骈文对举的广义概念。六朝以前所说的“散文”,是与韵文(诗与赋)相对而言的;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人所标榜的“古文”,则是与风靡六朝的骈文对举的。在清代骈文家文章中,“散文”一词屡屡出现,但也只是在“骈散”对举这一种意义上使用此概念的。在我国古代“散文”观念上,尽管有广义与狭义之别,但始终是一个大散文的概念。其实,比“散文”概念更为通行的概念是“文章”。先秦两汉有“文章”说,刘勰有文笔说,韩、柳所标举的古文,指的都是无韵的、散行体的文字,既包含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同样也涵盖非文学意义上的“散文”。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我国并没有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散文概念。

之所以出现这种泛散文观念,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应是儒家“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儒家诗文理论的一个核心,就是要求文艺有利于社会教化,那些能够直接“传道”的文体样式因此也都被当作文学来看待了。近代上海散文的发展,也不能例外地受制于这样的文学观念。特别是在外辱频仍、内乱迭起、大清帝国面临亘古未有之变、有识之士纷起讲求御辱救亡之方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之下,要求散文肩负开启民智、疗救时弊、保种图存之类社会责任,更是天经地义的分内应有之事。近代上海散文乃至全国散文都是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就具体的近代上海散文来说,在将近 80 年的时间里,本身也在发展变化。其中既有散文文体自身发展的因素,更直接的原因则是时代的需要促进了散文的发展与变革。不同的时代特点、不同思想的作家群体和个体、不同的文化环境,都可以导致散文在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上的不同。大致说来,我们可以将上海近代散文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

1843 年—1895 年:变革孕育期

在开埠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上海的散文和全国相较,并没有什么显山露水之处,既乏为人乐道与新人耳目的佳作,更无具有影响力与创作成就的作家。但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近代报刊业的兴起与新思想的传播。

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与外国传教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目的当然在于宣传宗教,但为了将刊物办得更有吸引力,传教士们也时常刊登一些科学、文学以及新闻报道之类的内容。1857 年 1 月 26 日,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六合丛谈》月刊,为外资经营的最早采用汉字铅字的中文杂志。除了宗教内容之外,这本杂志还介绍西方文学、文化与人物。1874 年 9 月 5 日,《教会新报》改名《万国公报》,成为以报导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宣扬破除祖先迷信、反对吸食鸦片、鼓吹女子放足、学习西方文化、介绍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民主政治思想等等方面的内容,尽管他们的宣传还很肤浅甚至存在着许多荒谬之处,但对于长期生活在闭关自守、文化专制的封建社会中的士大夫来说,这毕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人们从当时报纸杂志、西译书籍中获得了大量新鲜的知识与启迪,思想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学空虚无用的弊端在西方文明的参照下,日益醒目地凸现了出来。因而“士风丕变,咸知求有用之学,不沾沾于帖括。”(《上海县续志》)

学贵实用、学以致用、采西学、求富强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些报刊杂志如火如荼地出现之后,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宣传更是大张旗鼓,开启民智、变法图强更是深入人心了。而这正是近代散文发生变化的社会和文化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近代上海散文的发展、变化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对桐城派的不满与新文体的萌生。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鸦片战争后,桐城派作家对乾、嘉以来所盛行的不顾国计民生、埋头故纸堆的考据之风进行了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许多作家开始面向现实,切合实际,桐城派散文甚至在曾国藩手中得到了“中兴”。但桐城派散文对近代这一时期上海散文作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相反,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对桐城派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攻击。他们公开反对桐城派的“义法”、“古文辞门径”,大力倡导“自抒胸臆”之文。在这些散文家的笔下,几乎所有的当时社会问题都得到了反映,几乎所有强加在散文写作上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都遭到了抨击。而在散文创作的形式上,散文文风明显朝着通俗化、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郑观应还是王韬,他们的文章大多数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他们都是第一批报刊政论作家,他们用通俗易懂的古文写作报刊政论,报章政论文体得以确立,并成为19世纪90年代梁启超等人“新文体”的先声。报刊业的发展对散文的近代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1872年创刊、与上海散文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申报》在创刊号上就明确地要求文章“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梁启超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法、家法,无复向者。”(《饮冰室合集·中国各报存佚表》)这句话是符合当时上海散文发展实际的。

1896 年—1905 年:勃兴发展期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变法维新运动的迅猛展开,上海散文的发展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如火如荼的全面鼎盛时期。1896 年 1 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沪上总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乃群中外之图书器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讲习其间,而因推行于直省焉”(《上海强学会后序》)。4 月,梁启超到上海主笔《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主张废科举、办学校、开议院、讲商战,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教育。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出版以后,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影响巨大。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上的这些文章,被认为是“时务报体”的代表,梁启超从“犹恐文义太颐,不能尽人而解”的角度,竭力鼓吹改变当时文字与语言分离,桐城派、八股文独霸文坛的状况,主张报章语言要浅易通俗,报章文体要灵活自由。“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 25,《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9 册)这种新文体,内容切中时政,有感而发,形式自由灵活,富于变化,语言通俗易懂,杂采新事物、新名词术语乃至民间口语入文,远较古文活泼丰富,风格上具有民族特点。这种文体有力地瓦解了八股文程式,突破了当时统治文坛的桐城派、阳湖派绳尺,给人们一新耳目之感。郑振铎先生评价说:“他(按:指梁启超)的散文,平心论之,当然不是晶莹无疵的珠玉,当然不是最高贵的美文,却另自有它的价值。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通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

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1929年)梁启超开创了“时务报章文体”,在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期间,梁启超坚持对报刊文体作进一步的改革,他对封建专制的痛恨与忧国忧民的感情,促使他的舒卷自由、亦骈亦散的散文进一步散发出迷人的魅力与惊心动魄的力量。梁启超的报章文体,为晚清散文文体解放和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其文风和对社会的影响,开创了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

在梁启超新文体的影响下,上海的散文创作出现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由于新文体最适宜做宣传、鼓动的工具,自觉地仿效新文体写作成为一时的风气。无论是主张推翻满清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信奉改良主义的保皇派或资产阶级立宪派,甚至是具有优厚的旧学根底作家,他们众多的文章都受到新文体的影响,不少人自觉地仿效新文体进行写作,使上海散文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报章文体也在这一个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逐渐走向成熟。

新文体的出现,是散文为适应时代要求而在近代的新发展。它一扫古文陈腐、呆滞之弊,不拘一格,自由活泼,富有形象性与鼓动性。它的出现,使统治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古文遭受重创,几乎土崩瓦解,也使得自古以来文言文统治文坛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它使五四白话文和二千多年的古文之间有了一个平稳的交接。

1906年—1916年:回落分流期

1906年,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日本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上海、天津以及新加坡、旧金山等地的革命派与保皇派都卷入了这场持续数年之久的论战,双方的二十多种报纸就革命派与保皇派12个有着根本分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驳难与攻击。近代上海散文在全国中心位置一度转移到了日本。此后,近代上海散文的

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缓、多头分进的发展时期。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这种笔战在中国的政论文学史上很有一点良好的影响，因为从此以后，梁启超早年提倡出来的那种‘情感’的文章，永永不适用了。帖括式的条理不能不让位给法律家的论理了，笔锋的情感不能不让位给纸背的学理了。梁启超自己的文章也不能不变了。《国风》与《庸言》里的梁启超已不是《新民丛报》第一、二年的梁启超了。”（《胡适文存》二集，卷二）将胡适的这段话作为对这一时期上海散文发展的总结，基本上是合适的。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新文体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不少作家从语言、词法、句法甚至语调等方面对它加以模仿，因此，我们阅读近代上海散文，其中不乏语言更浅显，文字更简洁，篇幅更短小的佳作，同时，有不少散文也承袭了新文体的弊病，如行文拖沓、堆砌辞藻、夸饰过度等。

与此同时，章太炎用魏晋文体所写的文章虽然因文字古奥难懂而受到人们的批评，但他的政论散文往往观点新颖，见解深刻，气势充沛，富有战斗力，同样传诵一时。严复的文章有桐城派的韵味，富有逻辑性。以章士钊为代表的逻辑文条理清晰，结构严谨，他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章的代表作家。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进一步丰富了上海散文的内涵。

综观上海近代散文这 70 多年发展历史，有几个特点是相当明显的：

第一，从散文的内容来看，基本上关注的是社会、政治的内容，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内容不尽相同，但近代上海散文作家对社会、政治参与的热情一直高昂。近代上海可以说是各种政治团体、组织和个人宣传及活动的大本营。散文自然成为他们发表政见、宣传思想的有力工具。而且上海近代散文的内容是和各种不同的报纸杂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务报时期、苏报及民

立报等报时期、民初各种政党报刊林立时期,许多作家正是以各种性质、宗旨不同的报刊杂志为依托,以宣传本团体、本党派的社会、政治主张为职志,紧随着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演绎、变化,文章的时效性、针对性、说教性、论证性的特色非常明显。

第二,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是政论文,抒情散文与记叙文很少。在近代上海乃至整个中国,要求变革现实、谋求图强生存的思想已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广大作家面向社会,关注现实,急切地用手中的笔来疗救时弊,笔触涉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每一个问题。上海近代散文之所以能够急速地发展与繁荣,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改良与革命浪潮的蓬勃兴起与迅猛发展。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得到了再一次的宏扬、光大。从根本上讲,这也是传统文学观念在近代的延续——从总体上来看,传统散文就是以论说为主的。而近代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更容易触发士大夫的传统社会责任感和功利观。大难当前,谁还有闲情逸致去吟风弄月,抒发伤春悲秋、荣辱得失之类的感情呢。

第三,从表达的方式来看,上海近代散文又具有鲜明的说教色彩。近代作家拯救社会“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与“先觉觉后觉”的自觉意识,都化作不遗余力的改良或革命的启蒙宣传,许多散文实际上只不过是作家社会、政治思想的载体,作家们更多关心的是思想的传达,而不是散文艺术性的要求。梁启超的写作态度就恰如其分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与严幼陵先生书》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对自己的写作情况及写作态度有所说明:

“承规各节,字字金玉。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谏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颡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论议,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当《时务报》初出

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

黄遵宪也说：

“馆（按：指《时务报》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原注：‘任公盛推麦孺博，弟深信其言。’）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章君《学会》，论其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则善之善者矣，然如此即难能可贵矣。才士也夫！”（1897年4月12日黄遵宪《致汪康年书》，见《汪康年先生师友手札》）

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里，谁还有心思花费在文辞、结构、布局、照应之类的末技上呢。文学无用论在近代还是有相当的“市场”的。那么，上海近代散文缺乏名篇佳作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第四，从语言的角度来看，通俗化的倾向日趋显著。近代上海散文，很难具体描述它的语言特点。在民国初年，一度遭受压抑的骈文、桐城派古文再度抬头，甚至还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是，从《时务报》以降，新文体的影响无所不至，绝大多数文章都模仿新文体的笔调，半文半白，蔚然而成风气，流风所播，深入人心。章太炎说：“报章小说，人奉为宗”，虽然无可如何，但毕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文学发展规律的角度，用进化论理论来批判文言、提倡白话，是近代才出现的新气象，我们看五四以前的散文，纯然文言者，毕竟寥若晨星。